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

□ 马德宝 刘 祥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贯彻落实军事战略方针，不仅是军队的责任，也是全党全国的责任，要深化军事战略问题研究，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军事战略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思想，有效地指导了各个时期的军事斗争，时至今日仍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特约军事科学院相关专家，撰写了一组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指导的稿件，以飨读者。

军事战略观，是对军事战略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等问题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能否形成科学的军事战略观，决定着战争指导的层次，影响着战争进程和结局。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战略观，为党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石，也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战略服从政略，政治基础决定着军事战略选择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流血的政冶”，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把人民军队视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武装集团，创造了“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要求人民军队承担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强调把打败敌人与动员群众、创建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统一起来，形成了武装斗争与各条战线斗争相结合的整体斗争思想，要求把歼灭敌人提升到战略地位，等等。这些思想，体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路线的内在要求，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路线。

政略决定战略，奠定了战略选择的范围。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派人收集毛泽东所写的战争著作，试图找到击败我军的方法。抗美援朝时期，美国人研究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军，法国军队领导机关还出版了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事实一再证明，包括战略在内的一切作战方法，是以特定的政治为前提的。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我写的小册子，是人民战争的小册子，反人民的战争、片面的，不可能利用。”这就说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民战争这个根本，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有效发挥作用。反人民的战争、片面的正义战争等，都无法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果非要照搬，要么失灵，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也派出部队到日寇后方打游击，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力量战斗意志薄弱、派系林立、纪律松弛、作风败坏，群众基础差，有的甚至鱼肉百姓，被老百姓戏称为“游吃队”，缺少在敌后实施游击战的政治基础。与国民党敌后游击力量的衰败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落实抗战民主政策，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使日军几乎无法掌握

其动向，在敌后游击战中屡获胜利、快速发展。

战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问题

战略战术作为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对战争胜负具有直接决定作用。纵览古今中外的战例可以发现，有的因指导不当造成兵多将广而败，有的因指导高明却能实现以少胜多。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军力、经济力、地理等客观因素，只是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可能，要把这些可能变成现实，必须有正确的战争指导。

毛泽东认为，在战争指导的游泳术中，“战争的胜负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与刘邦争夺天下。项羽是名战将，勇猛过人，巨鹿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名声大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常胜将军”，却在垓下之战中败北，并自刎于乌江，让刘邦在楚汉争霸中最终胜出。项羽失败的的原因很多，就军事上看，在于输得了战斗，输掉了战略，是典型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但是光有战略指导的正确还是不够的。要赢得战争，就要在正确战略指导的基础上，实施正确的战役战斗指导。这是因为，战略既决定战役战斗，战役战斗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战略全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果大多数战役战斗失败了，或是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的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再好的战略设计都会落空，战争就会走向失败。因此，要把战略上的胜算变成现实的战争胜利，还要实现大多数战役战斗的胜利，特别是要确保决定性战役战斗的胜利。战役战斗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为战略上的优劣态势并不等同于、自动转化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劣态势，通过努力，即使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也可以在

战役战斗上形成优势、获得主动。落实战略上的胜算，在战役战斗的作战形式上，与战略可以是同向相行，也可以是相反相成。比如，弱的一方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可以而且必须在战役战斗上是进攻的，这样才能推动力量对比转变，最终打赢战争。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由此可见，他是从与战役、战斗相对应的角度来界定战略的，并从全局与局部的哲学高度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战争指导规律。把军事战略界定为战争指导全局的规律，揭示了战略的独特内涵，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他从军事战略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军事战略作了简洁、准确、科学的界定，把人们对军事战略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对军事战略的全局的具体内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和战术学的任务。”由此可见，他是从与战役、战斗相对应的角度来界定战略的，并从全局与局部的哲学高度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战争指导规律。把军事战略界定为战争指导全局的规律，揭示了战略的独特内涵，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他从军事战略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军事战略作了简洁、准确、科学的界定，把人们对军事战略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的联系，主要是各军兵种力量间，主攻与助攻间，作战与支援、保障间的协调与统筹；五是敌我友之间的整体关照，要把自己的行动、部署等与敌人的有关情况结合起来，与友军的有关情况联系起来。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照顾战争的全局

毛泽东要求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找到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有效办法，红军在他的指挥下往往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而一旦他被剥夺战争指导权、红军不再按照他的办法打仗，经常就会打败仗。解放战争中，毛泽东领导100多万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400多万国民党军。毛泽东能赢得一次次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极具想象力、洞察力，能及时提出独创性的战略创意，找到了正确的军事战略，在战争指导上重视抓大放小，充分发挥一线指挥员的作用，进行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而蒋介石却注重细节，在军事战略上缺少创见，在军事指挥上好一插到底、越级指挥，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抓大放小，还体现在关照要害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全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关照全局还需要落实到抓住枢纽上，并提出要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在战争指导上，他对事关全局的枢纽也抓得很紧。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要求林彪攻打锦州，切断国民党军从东北向华北撤退的后路。而林彪基于各种考虑，一再推迟落实毛泽东的战略要求。在攻打长春失利后，林彪才转兵准备进攻锦州，但获悉蒋介石增兵葫芦岛后他又出现动摇，准备弃打锦州，回攻长春。在罗荣桓的力劝特别是毛泽东4A急电的严令下，林彪才组织力量成功攻占锦州。对锦州一役，被俘的国民党守军将领范汉杰由衷感慨，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攻占锦州，完成了对东北国民党军的关门打狗之势，难怪蒋介石听到锦州失守的消息后暴跳如雷。



正洞西山战斗，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创造的阵地进攻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光辉范例，也是首次组织的多兵种协同战斗，更是反“兵不重伏”之道的神来之笔，突显了我志愿军“因敌制胜”之妙。此战斗发生在第五次战役后秋季防御作战中，于1951年11月4日夜至6日，由志愿军第47军首长直接指挥第139师的第415团和第141师的第421团主力对美骑兵第1师7团战斗。志愿军按照同一作战方案先后组织2次进攻，歼敌7个连共2522名，俘53名，缴获各类枪炮500余件，重挫美骑兵第1师，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力地配合了板门店停战谈判。

因势利导，深入动员。《孙子兵法》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圜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战前，我志愿军早就憋足了一股劲儿。在持续近50天的秋季攻势中，敌攻我守，虽然先期第139师付出较大伤亡，但各师依托既设阵地，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采取近战歼敌战法，硬把气势汹汹的秋季攻势变成“攻不动”的依托阵地据守。我志愿军认识到对手不过是装备现代化的“纸老虎”，是可以战胜的。第141师的第421团作为军预备队参战不多，上下摩拳擦掌，准备挫挫这只“老虎”的锐气。第139师更是要与美骑兵第1师算算老账。10月25日，板门店谈判恢复。即日，美骑兵第1师占领了正洞西山并据守。战机难得。第47军坚决落实志愿军司令部“要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作战指导，决定收复正洞西山，以积极作战为停战谈判造势。军里专门加强较多的坦克、炮兵、高炮、工兵等力量参加作战。战士们见到我与敌兵力比7：1，我炮火又占有压倒性优势时，斗志昂扬。第421团团长郑波先让二营于1日晚打新村南山立了头功，其余两个营见此纷纷请战。第139师第415团更是恨不得立即开战。团营连因势利导，组织深入的思想动员，进一步激发了战斗积极性，群众争着立功入团、团员争着立功入党、战斗英雄争着功上加功。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此役使我军士气大涨。

紧锣密鼓，万全准备。实践证明，详细的侦察、细致的协同、必要的物资补充等战前准备是获胜的必要条件。10月31日，第47军军部即召开开会明确任务，解决困难。次日，各指战员遂展开地地侦察。上至团长下至战斗组长逐级地多次组织了现地侦察，看地形、查敌情、明确任务与协同。特别是根据美军习惯实施火力报复的特点，明确夺占正洞西山后，2个连坚守，其余撤出战斗。另一方面，由于是首次多兵种合同作战，团长亲自现地组织协同，包括炮火准备时的协同、步坦炮展开时的协同、突击连队与后续梯队之间的协同等。经过4天周密准备，我参战部队多兵种协同作战意识大大增强，整体作战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此外，军里调配了较多的物资器材，包括集中两个师的通信器材实现连、团直接通话；集中7000发炮弹，增配枪支弹药，平均每连配发了30到50件的爆破器材，每人保障6—8枚手榴弹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万全的战争准备极大地增加了全歼守敌的胜算。

指挥多样，灵活靠霸。在当时，持续的靠前指挥是准确把握战场态势，正确定下决心，最终夺取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此次战斗中，志愿军采取了集中指挥、委托式指挥等多种指挥方式。整个作战由第421团团长郑波统一指挥，较好地解决了诸兵种协同作战问题。特别是5日夺占前沿阵地后，美军收缩兵力，负隅顽抗，致我攻击受阻。指挥所及时指挥实施30分钟火力急袭，并将二梯队、三梯队先后投入战斗，有效地实现了再歼守敌的决心。委托式指挥能够充分发挥一线指战员主观能动性，便于及时把握战机，灵活实施作战。在4日夺占1号、2号主峰时遭火力猛烈压制，一营副营长及时组织两个连的六〇炮集中压制，配合一、三连三面攻击，最终仅用时3小时全歼主峰之敌。我志愿军又巧妙地将多种指挥方式结合起来，灵活应对战场情况。在5日防御作战中，虽然只有2个连坚守，但指挥所集中指挥各兵种予以支援。2连在连长王汝启指挥下与两个加强了飞机、炮兵、坦克的美军步兵营近战。反冲

正洞西山战斗：阵地进攻战的神来之笔

□ 赵博

锋时，一个战士倒下了，还会有更多的战士跳出来，举着爆破筒冲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2个连队先后打退美军营进攻7次，歼敌1个营。这次防御打怕打疼了美军，致使其6日不敢再大规模进攻正洞西山。可谓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上下同欲，军士不疑也。

善用地势，因敌制变。部队的作战部署离不开对敌情、地形、我情的合理判断。善用地势，因敌而变，以己之强攻敌之弱是好的战斗部署的体现。这次战斗我志愿军采取了“阻援打点、钳形攻击，诱袭歼敌，梯次接力”的打法，地形也对我有利。正洞西山狭长，不便展开较多兵力，美军仅部署2个步兵连和1个火器连。此山孤立突出，与我阵地交错，又与我军进攻出发阵地形成品字格局，便于我志愿军从两翼乘势而上，合力钳掉这颗“钉子”。另一方面，东侧1676高地和南侧1986高地之敌可能对其增援，因此有必要切断其联系。在我军冲击道路上，美军设置雷场、鹿砦，扫除植被，不利于我军硬打硬冲。对此，我军采取了小股兵力诱敌暴露，多波次炮火覆盖，在大量杀伤美军、破坏其工事障碍的基础上以坦克引导步兵冲锋，作战效果良好。战士们都说“该老美吃我们的炮弹了”。结合地形和逐个夺占高地的实际，指挥所确立的多梯队接力的打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两次作战，我军都是成4个梯队部署，4日战斗用了2个梯队，5日战斗用了3个梯队即实现了作战目的。特别是5日晚，考虑到美军虽然抢占了正洞西山，但立足未稳，工事障碍尚不成体系，士气低迷等情况，郑波团长提议当晚再打一次，出敌不意，全歼守敌1个营及1个连大部。相同部署、相同战法在同一个阵地对同一个敌人作战连续获得两次胜利，在我军战史上实不多见。可谓首战以正合，再战以奇胜。

正洞西山一役给美骑兵第1师“老牌第7团”以重创。自此之后，美骑兵第1师被调至二线，最终“开国元勋师”黯然离开了朝鲜战场。



“扶贫将军”熊兆仁

□ 李明坤

熊兆仁是福建省永定县人。他1912年出生于永定县湖雷乡，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2019年辞世，享年107岁，是最年长将军之一。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而浴血奋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熊兆仁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全部力量。

1925年开始，熊兆仁在共产党员阮山等创办的毓秀学堂、上湖公学、下湖公学各读了一年书，其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担任中共地方党组织交通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爬山越岭秘密递送文件和情报。他17岁参加工农红军，21岁加入共产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永平靖（永定、平和、南靖）游击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在战斗中总是冲在前面，表现十分勇敢。红

军主力长征之后，熊兆仁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对党的信念都坚定不移。在抗日战争时期，熊兆仁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先后担任连长、连指导员、营政委、团参谋长、团政委、苏浙军区第三军分区分司令员、第一军分区分司令员等职，参加和参与指挥了多次战斗，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苏浙皖边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部长，为巩固苏南敌后根据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南下作出了积极贡献。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有一组经典镜头，在江北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向天空发出三颗信号弹后，我江南部队也立即在山头上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作为接应，这支江南部队就是熊兆仁领导的江南游击队。

新中国成立后，熊兆仁先后任皖南军区副司令员、皖北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3月，他调至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高级速成系学习，1955

年3月毕业。同年，他和1000多名战友一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授衔后，熊兆仁回福州任第十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1956年7月，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后来又任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熊兆仁勤勤恳恳工作，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1959年2月至1964年9月，熊兆仁任福建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1978年12月，福建省政协举行四届二次会议，增补熊兆仁为省政协副主席。在政协工作期间，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贡献。1978年，在老区群众和老同志的呼吁下，福建省决定恢复各级老区建设委员会，下设老区办公室。1981年，省老区建设委员会及下设老区办公室正式恢复成立，熊兆仁兼任老区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他的足迹遍布福建老区的山山水水，为福建老区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6月，熊兆仁将军离休，但他仍然情系老区人民，为老区扶贫

事业奔波操劳，做了大量对老区人民有益的实事，被老区群众亲切地称为“扶贫将军”。熊兆仁经常说，你既然是将军，就要像个将军的样子，为党奋斗终身，为人民服务到底。熊兆仁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经常到老区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反映情况，解决问题。1990年，他组织动员曾在福建及闽西战斗和工作过的13位老红军、老将军、老同志联名写信反映情况，促成了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1997年，他再次为龙赣韶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奔走，多次乘车往来闽西老区和北京之间，积极反映情况，争取资金扶持。终于，这条铁路于2001年12月动工，2005年10月建成通车。当地群众都说，这条铁路的修成，与熊兆仁的关心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